

云冈石窟研究三种

张畅耕 员海瑞 辛长青

云冈石窟的历史地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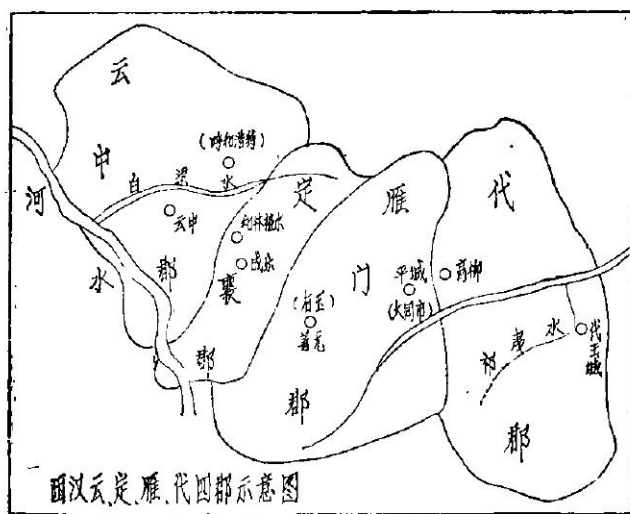
研究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往往要涉及沿革地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根据近年学习所得，理成三事，书供研究与爱好者参考。

大同与战国云中郡

战国、秦汉时期今大同并不属于云中郡。《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这则史料，对于研究云中、雁门、代郡的沿革是重要的。然依此认战国云中郡即今大同地域则证据不足。因为它未说明三郡的关系位置和郡治所在。而且在考古方面迄今未见战国在大同设郡的遗迹。即以西汉时期的云中、雁门、代郡去追溯，其云中郡治云中县，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附近。雁门郡治善无县，故地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城关。代郡故地为今河北省蔚县之代王城。它们距大同均有数百华里。因此，认为大同为战国云中郡地域，以及由此顺推秦统一中国后，大同仍属云中郡的说法，无论早期史料或近代考古资料均无可靠根据。

应当指出，不少人是根据乾隆时的《大同府志》和道光时的《大同县志》认为大同为战国、秦汉云中郡的。而府、县志的记载，均源于《辽史·地理志》。其“西京大同府”条下说“战国属赵，武灵王始置云中郡，秦属代王国，后为平城县……”。必须指出，《辽史·地理志》这一说法并无早期史料根据。其后，明代尹耕的《四郡考》又加深了这一

错误。《四郡考》认为：“大同者，云中之东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邻也。”但近年的考古成果却表明，对于明代的大同城或广义的大同府辖境来说，西汉的云中、定襄、九原三郡，都在它的西北，地当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而代郡却是它的东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介于定襄郡与代郡之间，拥有十四个县之雁门郡，《四郡考》居然漏掉了。故尹耕的上述结论，纯属臆造。（图一）



图一 西汉云、定、雁、代四郡示意图

还应指出，主编《大同县志》的黎中辅，曾在《云中辨》一文中，正确地考证了大同与云中郡的关系。遗憾的是，在该书“沿革”的“地表”部分，仍沿袭旧说。

战国之云中郡与今大同无关，但是唐代中叶以后，大同确曾设置了云中郡。其经过是：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平城（恒州）沦为废墟。北齐天保中，废恒州为恒安镇，隶属太平县。北周改太平县为云中县，隋又改

为云内县，恒安镇仍隶属。唐贞观十四年，将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云州及定襄县治，移于大同附近。开元廿年改定襄县为云中，天宝元年再改为云中郡，这是大同称云中之始。可以看出，大同之称云中是历史上移迁所致，这与雁门郡治西汉以来自右玉迁山阴，再南迁代县；定襄自和林格尔迁大同，再南迁今定襄县是一个道理。还有人认为大同称云中，是因为云冈居中，其东西百里有云东、云西之故。其实左云县的云西堡是明代卫所制的产物，明建堡墙仍在。用它证唐代大同之称云中，显系附会。文献史料和考古成果均已证实，大同为西汉雁门郡的东部都尉治所平城县地，其与战国、秦汉时期的云中郡并无隶属关系。

武州山麓的武州塞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麓，北魏时就称之为“武州山石窟寺”。武州塞也早已载诸史册了。《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里，有单于将十万骑入武州塞的记载。

《魏书》的《释老志》里也提到释昙曜在平城西边的武州塞开凿石窟的事情。北魏卓越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瀑水》里，曾四次提到武州塞：

1.（马邑西川）“东逕马邑县故城南。干宝《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乃不崩，遂名马邑。”

2. “桑干河水又东，左合武州塞水，水出故城东，南流出山。逕日没城南，盖夕阳西颓戎车所薄之城故也。东有日中城，城东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时城，在黄瓜阜北曲中。”

3. “如浑水又东南流逕永固县，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

4.（武州）“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前述四笔武州塞所涉及的城邑、水道、距离各不相同，显然是指四个地方。对于雁门郡的武州塞，历代有人探讨。如《寰宇记》引《冀州图》说，“武州山东西数百里是也。”清代的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认为“武州塞蔓延甚广”。抗日战争时期，水野清一等人在研究云冈石窟的过程中，也探索了武州塞。在《云冈石窟》的序言中，他写道：“总之，武州山或武州塞，是在现在的左云县附近广阔地延伸着的。”

然而，武州塞究竟何指呢？必须首先确定武州塞的位置，才能正确地判断与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对前述四处武州塞的调查情况是：

1. 西汉雁门郡的马邑古城在朔县境内。自马邑北向雁门郡治善无县（今右玉）和武州县（今左云）的大路，就是朔县北面的源子河谷。源子河长达一百余华里，沟深谷宽，细流潺潺，为交通要冲。《匈奴传》提到的“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可能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汉武帝刘彻在马邑附近山谷伏兵三十万以惩匈奴的马邑之战。因此，秦汉马邑城北边的武州塞，就是今天的源子河谷。（图二）

2. 武州塞水就是今天的大峪河。它源自左云县南，东流经著名的瓷乡吴家窑。出山后，其故道逕日没城（今山阴县永静城）南，其东有日中城。今天的日中城村就位于古城之侧。因而武州塞水所行，约是今大峪河的河谷。

3. 北魏时的如浑水即今之御河，羊水即今之淤泥河。淤泥河源自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南，循山谷北出，东转入左云县境，再东南流，汇入御河。北魏故都平城的西苑，大体上就是今大同市城区以北部分。由此可知，“平城县西苑外”的武州塞，即今淤泥河之上源河谷。

4. 平城西，武州川水所经的武州塞与塞

题记内容

题记位于十一窟东壁南端上部，距窟内地面约十一米。依窟壁沙岩阴刻，宽七十八、高三十七厘米。共二十四行，行十四至十六字不等，共三百三十七字。字大约 3×2 厘米，少数略有剥残，绝大部分完整。全文是：

“太和七年，岁在癸亥，八月卅日，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毘境，靡由自觉。微善所鍾，遭值圣主，道教天下，绍隆三宝，慈被十方，泽流元外。乃使蓂夜改晷，久寢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润，信心开敷，意欲仰洲洪泽，莫能从遂。是以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厝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逾转轮，神被四天，国祚永康，十方归伏，光扬三宝，亿劫不隧。又愿义诸人，命过诸师，七世父母，内外亲族，神栖高境，安养光接，託育宝花，永辞秽质，证悟无生，位超群首。若生人天，百味天衣，随意飡服。若有宿殃，堕洛三途，长辞八难，永与苦别。又愿同邑诸人，从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洁，明鉴实相，晕扬慧日。使四流顷竭，道风堂扇。使慢山崩颓，生死永毕。佛性明显，登阶住地，未成佛间。愿生生之处，常为法善知识，以法相亲，进止俱游，形容影响，常行大士，八万诸行，化度一切，同善正觉，逮及累劫先师、七世父闕。”（图版捌）

造像缘起

题记时间是“太和七年，岁在癸亥，八月卅日”，即公元483年的10月17日。这一年孝文帝拓跋宏十七岁，北魏的最高权力仍操在其祖母、汉族出身的太皇太后冯氏手中。是年四月，生了皇子恂。所以题记下文，有“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的称呼。造像者是“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

造像缘起“自惟往因不积……久寢斯

悟”这段文字十分隐晦，说的是北魏太武帝、文成帝的灭法与复法。

公元四世纪末，统治了中国北方的鲜卑族拓跋氏，不但与被奴役的各族劳动人民的矛盾十分尖锐，即与依附他们的汉族上层分子也不断发生矛盾，同时，皇族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也与日俱增。在这种状况下，依附统治阶级的释道二教，不可避免地要牵连进去。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听信汉族出身的司徒崔浩崇道灭法的建议，“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①“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②太武灭法使佛教在中国受到了第一次沉重打击。题记说的“往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毘境，靡由自觉”即指此事。

四年以后（公元450年），拓跋焘又收拾崔浩，“浩诛，备五刑”。^③又三年，近侍宗爱刺杀拓跋焘，复杀被其一手扶植的南安王拓跋余，拓跋氏政权陷入危机。当此时，太武帝的嫡孙，十二岁的拓跋濬，在高允、源贺、陆丽的支持下，一举戮杀宗爱，恢复了拓跋氏统治，这就是文成帝。拓跋濬登极后，立即复法。其诏书说：“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篤，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④在文成帝倡导之下，于是“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得复显。”^⑤这就是题记中颂扬的“遭值圣主，道教天下”，“乃使蓂夜改晷，久寢斯悟”。

题记接着说，“弟子等得蒙法润，信心开敷，意欲仰洲洪泽，莫能从遂”。敷同敷，洲同涛，俗作酬，“仰洲洪泽”，含有皈依的意思。但是，“莫能从遂”。为什么呢？从全文推敲，恰

是被“诸师”谢绝了。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

公元471年（太和五年），平城爆发了法秀起义。这次起义时间虽然短暂，但影响深远。起义发生在北魏的统治中心平城，为首的是个佛教沙门，起义者数多达千人，其中不仅有奴隶、僧徒，还有秀才和下级官吏如王稚、张术等。起义对拓跋氏政权的打击是沉重的。事后，文明太皇太后冯氏曾对镇压这次起义立功的大臣荀颓说：“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⑥由于起义是沙门法秀发起的，有不少僧徒参加，所以此后北魏统治者对佛教施加各种约束。统治者一方面利用佛教麻痹人民，另一方面却又警惕佛教为人民所利用。对此，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任城王元澄在给世宗元恪的奏疏里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姦誑，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⑦造像题记作于法秀起义后二年，对起义者的镇压刚刚过去。余悸犹存的“诸师”，对数十义信士女“意欲仰洲洪泽”，实在“莫能从遂”。

石厝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

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特征是：主体突出，两翼对称，整体谐调。这在云冈的许多洞窟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然而，十一窟窟壁给人的印象却是杂乱无章：东壁平整而龕像错落，造型皆小；西壁出檐有七佛立像，其大超人。这说明壁面的雕造并无统一安排，而是由若干组造像组成的。

何处是题记所指的九十五区石像及诸菩萨？我们认为，应是东壁南端上层，自九个伎乐天以下至造像题记下线，高约三米、宽约二米的一组。（图三）理由是：第一，居本组主体地位的弥勒、释迦、多宝等七像，连同两侧小龕中的八十八像，即是九十五区石像。第二，题记上部龕内，自左至右题

名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此三像即是诸菩萨。第三，诸菩萨及题记两侧有供养人像，左侧三十七人，右侧十七人，即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夹领小袖是迁都洛阳以前的鲜卑服式，高露足为男，裙曳地为女。第四，紧靠题记两侧有邑师像四人。左侧一人题名为“邑师道员”，右侧三人，自左至右题名为“邑师法宗”、“邑师昙秀”、“邑师普明”。此四人即题记中的“诸师”。总之，本组造像与题记所载的邑义信士女、佛、菩萨、诸师等，从内容到数量完全相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侧第一排小龕佛像，因石壁不整，只能容纳三尊，故在观世音菩萨的左上方，供养人的南侧，依样增雕一区以足九十五之数。

还应指出的是，“石厝形象”的“厝”字，长期以来，被误认为“庙”。^⑧按《说文解字》：“厝，厉石也。……诗曰：他山之石，可以为厝”。又如本题记“厝”作“厝”，庙则应从广从朝。一窟之内造九十五石庙，在云冈第十一窟中无物以证。

小 结

十一窟东壁太和七年造像与题记相合若契。四邑师，五十四义信士女以及九十五区石像诸菩萨等，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各阶层的若干人物。题记是魏碑方笔之精品，其内容反映了平城时代北魏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证实了太武帝文成帝之际的灭法复法与云冈石窟造像的因果关系。故本组造像与题记，对研究石窟本身历史分期与艺术成就至关重要。它启示，对石窟现有题记深入调查，并结合造像进行研究，实为石窟艺术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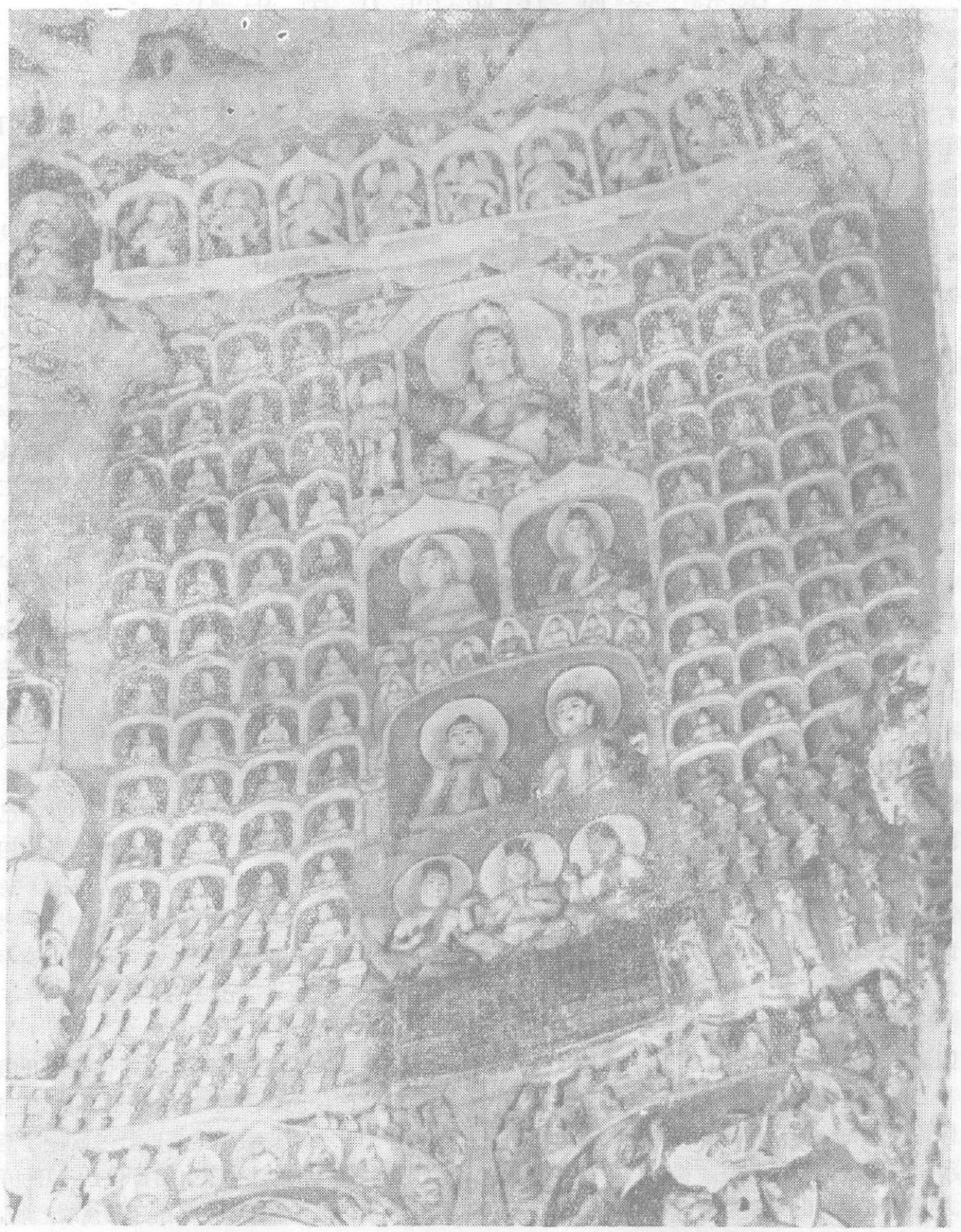
① 《魏书·世祖纪》。

②④⑤⑦ 《魏书·释老志》。

③ 《魏书·崔浩传》。

⑥ 《北史·荀颓传》。

⑧ 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八——九卷（1953年）49页。



图三 云冈第十一窟太和七年造像与题记

试论昙曜五窟的开凿年代

著名的昙曜五窟就是现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中的第16至20窟，因系北魏时沙门昙曜主持开凿而得名。从其形制、造像的内容及雕造技法等方面来看，它们是云冈石窟群中开凿时代之较早者。因此，进一步考察昙曜五窟的开凿年代，对于研究云冈石窟群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长期以来，关于昙曜五窟的开凿年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在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年），^①有的认为是在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②这些看法主要都是根据《魏书·释老志》。为了弄清问题，现将《魏书·释老志》这段有关记载全文引录如下：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徧于州镇矣。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③

以上这段文字共叙述了五件事情。第一件是：“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第二件是：“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第三件是：“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

于一世。”第四件是：“昙曜奏：……徧于州镇矣。”第五件是：“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这五件事情全是关于昙曜之事，它们彼此是有关的。但是，明显得很，它们并不都是和平初年发生的事情。具体来说，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和平初。而第二件事情则是追述过去之事，即补述昙曜在文成帝复法之明年（文成帝在兴安元年复法，复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受文成帝之命，由中山赴京城（平城），帝奉以师礼。第三件事情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但从文义上看，这件事是连在第二件事之后，也是追述过去之事，即昙曜在复法之明年到达平城以后，请于文成帝，受命于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如果这件事是在和平初年，就应该放在第一件事之后紧接着叙述，而不应该放在第二件事之后加以叙述了。第四件事情即建立僧祇户、粟等，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如高肇奏言中所说：“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奏凉州军户赵荀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④已是孝文帝时期的事情了。第五件事为译十四部佛经，也不见得是和平初所能完成的。总之，从《魏书·释老志》这段记载来分析，昙曜开凿这五所石窟应在他受命由中山来到平城之时，即文成帝复法之明年（兴安二年、公元453年）。

其次，我们不应当孤立地考证昙曜开凿石窟的时间，而必须把这件事情放到北魏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实际中去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在中国古代，石窟的开凿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国时起，即尊崇佛道二教，作为麻痹人民反抗斗争意志、巩固北魏统治

的工具。而佛教也投靠北魏皇帝，以求得自身的发展。“（道武）帝好黄老，颇览佛经。……天兴元年，下诏曰：‘……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闍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黼饰。”^⑤而道人统法果，则带头改变以前“沙门不礼俗”的习惯，对北魏皇帝加以礼拜。并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⑥到了太武帝晚年，由于北魏统治阶级残酷地奴役和剥削各族劳动人民，各族人民不断奋起反抗，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聚众十万，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的统治。并促使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激化，佛道二教之间的矛盾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因此，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用司徒崔浩之言，下诏灭法。“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⑦太武帝灭法不但使佛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而引起北魏社会的剧烈震动；而且使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激化，他们互相残杀，上下大乱，造成北魏王朝的危机。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己亥，诛司徒崔浩。”^⑧“备五刑。”^⑨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六月，太武帝长子拓跋晃（恭宗）忧薨于东宫。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二月，中常侍宗爱杀太武帝，秘不发丧，矫皇后令，杀东平王拓跋翰及兰延等，迎立南安王拓跋余。拓跋余以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并封为冯翊王。而“余疑之，遂谋夺其权。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⑩在这北魏统治陷入危机的紧急关头，太武帝之孙拓跋濬在高允、源贺、陆丽等人的支持下，驰马入宫，一举杀死宗爱、贾周等，平息了宫廷叛乱，是为文成帝。

文成帝即位以后，为了结束动乱，收买人心，稳定摇摇欲坠的北魏统治，立即采取

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复法。“高宗践极，下诏曰：‘……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⑪。不仅如此，文成帝还亲自为京师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

可以看出，文成帝复法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令昙曜由中山赴平城，并接受昙曜建议在京西武州塞开凿石窟，这就是云冈石窟开凿之始。昙曜五窟是北魏灭法与复法斗争的产物，是稳定和巩固北魏王朝统治的急需。因此，石窟的开凿理应在复法后抓紧进行。所以，石窟的开凿应始于复法之明年（兴安二年）昙曜受命来到平城以后，而不应在复法之后八年之久的和平初年。否则，开凿石窟的意义也就大为减弱了。

此外，复法之当年，文成帝又“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⑫“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⑬这些措施也都是在复法后不久进行的，也都没有拖到复法八年后的和平初年。凡此都可以作为昙曜是在复法之明年开始凿窟的旁证。

昙曜所开五窟不但是为北魏皇帝开凿的，而且其主体造像的形体和面貌也都是按照北魏太祖以下诸帝雕造的。16窟的主像释迦像（图四），面目清秀，少年英俊，可能就是文成帝的肖像。此像所穿的衣服是有领结的毛料厚衣服，是当时鲜卑族的服装。这一点也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开凿石窟是为了抬高拓跋皇帝的政治地位，巩固鲜卑贵族的统治。

图四 云冈第十六窟释迦像



我们认为，昙曜得任沙门统是在开凿五窟以后。很可能昙曜就是因为开窟有功，得到文成帝的赏识，才在和平初年师贤卒后，被任命为沙门统的。并不是做了沙门统以后才开凿石窟。总之，昙曜五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应是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

-
- ① 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上）603页。
 - ② 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一卷第4页。
 - ③④⑤⑥⑧⑩⑪⑫⑬ 《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6月第一版。
 - ⑦ 《魏书·世祖纪》。
 - ⑨ 《魏书·阉官列传》。

（上接第156页）

于木塔容易发生火灾，难保持久的缘故，此时已多用砖石建塔，砖、石为材，在建筑造型上便于灵活掌握，室内叠券比木架结构容易些，这就出现了六边形、八边形、圆形唐塔。

4. 唐代以前六角塔存在的可能性较小

从古代的石窟、壁画和建筑实物中，北魏时期已经有了方形、十二边形和圆形塔。^⑦但是，北魏至隋，却一直未见有六角佛塔出现。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六角塔只能有一面正南，一面正北，其余四面皆不得正向。这就无法象方塔、圆塔或十二角塔那样在四面开门，故不能适应早期佛事活动的需要。由此推想，唐以前的六角塔，存在之可能性较小。即便将来会发现唐以前的六角塔，也很

可能只限于墓塔而已。也基于同样原因，致使我国六角塔普及的时代向后推移了。

-
- ① 顾铁符先生在《唐泛舟禅师塔》一文中，认为此塔建于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即泛舟去世之年，较长庆二年早了二十九年。他认为刻塔铭前就应先建立塔。
 - ② 梁思成、刘敦桢在《塔概说》一书中，就曾根据当时的资料认为：“隋唐塔的平面，除去净藏塔八角形一孤例外，据我们所知，全是方形；……”；又如在鲍鼎《唐宋塔之初步分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一文所列八十多座名塔中，唐六角塔未有一例。
 - ③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
 - ④ 梁思成、刘敦桢合著：《塔概说》“隋唐佛塔”部分。
 - ⑤ 《魏书·释老志》。
 - ⑥ 《后汉书·陶谦传》。
 - ⑦ 敦煌428窟东壁南侧、萨埵那本生故事部分，见《敦煌壁画》21图。

太和七年歲在癸亥九月廿四日
信士女等五十人自唯往里不續至
木代廿四日庚辰由自實微主府鍾道
值聖主道教天下昭隆三寶教林大
澤永無水乃使長在既長又復斯皓
子等得蒙法潤信心開敏意欲即謝
澤真能後遂是以共相勸念為國興
福敬造石唐形像九十五圓入許署隨
額以此相上為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子德令
威臨轉輪中使長國在凡事十皇
伏光揚三德德初不隱願壽諸人
命過諸師七世父母內來親其神極為
業光耀記育實托孔慈微實證
光無位超躋首若生至巨味天衣
隨意養服若有宿疾隨治三益長
穉人難孔苦別為同念諸父從
舍佳直心曰隆武行清潔明
相靈揚慧曰使四派須如實所
堂有使廬山崩殞生死孔畢能性明
願金首佳地未成能開願主生之慶
常三善善知識以法相親進止俱
非空無常行大士不諸行伏
一初因主實是及聚無先斯大也

云冈第十一窟东壁太和七年造像题记